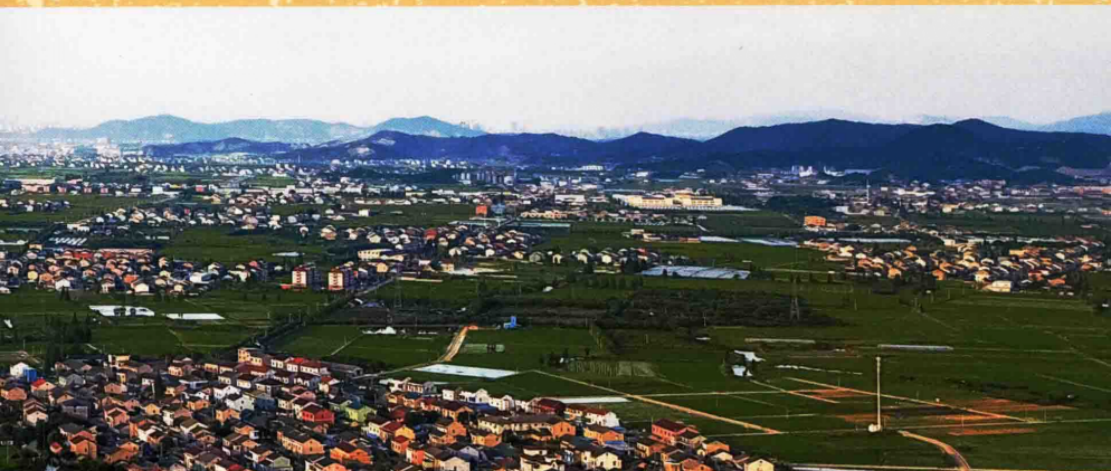


社会区隔 与相对贫困的再生产



董苾茜 © 著

社会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区隔与相对贫困的再生产/董苾茜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 4
ISBN 978-7-5680-8130-6

I. ①社… II. ①董… III. ①贫困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56742 号

社会区隔与相对贫困的再生产

董苾茜 著

Shehui Quge yu Xiangdui Pinkun de Zaishengchan

策划编辑: 曾 光

责任编辑: 曾 婷

封面设计: 抱 子

责任校对: 王亚钦

责任监印: 徐 露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 (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武汉创易图文工作室

印 刷: 武汉市洪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2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摘 要

作为世界性的难题,贫困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贫困成因及治理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并推动着贫困治理实践的反思与深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果。有关数据显示,在现行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累计减少 8239 万,贫困发生率累计降低 8.5%;2020 年年底所有的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然而,由于贫困的相对性和动态性,只要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贫困的客观性就将伴随社会不平等的长期存在而不断被反复生产和再生产。

对贫困的再生产机制的揭示存在“低均衡水平论”、“平层压力论”与“社会排斥论”。低均衡水平论的逻辑为:最初匮乏资本或其他要素的贫困者由于缺乏改善自身困境的条件,因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在该解释的逻辑下,通过物质资源或资金形式的补助便能中断贫困者不能自由选择的循环链条。而现实是相关福利政策不一定能帮助贫困者有效脱贫,甚至可能会带来再次返贫的“意外后果”。平层压力论假定共同体内部享有同样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共同体会通过施加平层压力,使被压制的成员和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留在相同或相似的位置,从而直接抑制或破坏个人流动及向上的努力。该观点适合用来解释传统或特殊的部落、族群以及其成员的持续性贫困,而对于现代社会中更为普遍的群体、个体的贫困的再生产则缺乏解释力。社会排斥论认为来自外部社会世界的排斥导致了贫困者某些社会权利的丧失以及形塑了贫困者的负面心理,而负面心理又会指引贫困者行动,使其陷入贫困的循环。其盲点在于简化了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即只注意到其他层次群体对贫困群体施加的作用,认为贫困者只能处于被动调试的状态。贫困者是否会主动参与对其他群体的关系建构,关系建构的动机与后果是否会影响其自身的贫困状态,成为探索贫困的再生产机制的重要的突破点。

本书以“社会区隔—自我区隔—贫困的再生产”为分析框架:日常生活风格的呈现是探讨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关系的逻辑起点。日常生活风格具体涉及居住模式和空间配置、饮食习惯及形象外表管理、文化投入等方面。日常



生活风格分化会建构并强化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边界,社会区隔与自我区隔在此过程中产生。在一个具体的村庄中体现为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日常交往的区隔、仪式人情中的区隔以及村庄政治参与的区隔。

居住模式及空间配置、饮食消费与身体(形象)管理、文化投入等方面都体现着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在日常生活风格上的分化。具体而言,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在居住模式及空间配置上存在着村庄空间住宅区位、私人空间、生活效率与品味追求的分化;在饮食消费与身体(形象)管理方面存在着必然品味与自由品味、装束与身体日常护理上的分化;在文化投入方面存在着闲暇时间支配方式、对媒介的应用方式以及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与方式上的分化。

日常生活实践形式不仅构成了社会分化,也成为社会分化的表达渠道和强化机制,强化着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边界。居住空间、闲暇时间安排与交往消费内容的分化共塑了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日常交往的区隔;村庄中富人主导的仪式人情规则构成了人情排斥以及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双重区隔;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的富人和相对贫困者的抗争与冷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区隔。

进一步深入本土挖掘区隔过程中相对贫困群体的生存发展状态与心理嬗变发现,相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价值正在区隔中遭到解构,失去社会价值的相对贫困人口逐渐退出村庄竞争,进而丧失了内生发展动力;由此,相对贫困人口社会交往的动机进一步减弱,而这又将导致其人情圈不断萎缩;无法向社会网络借力的相对贫困人口正逐步失去发展的机会;相对贫困者习性的延续性和传递性促发了个体贫困的延续以及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如此弱勢的积累导致了相对贫困的再生产。

关键词:相对贫困;再生产;社会区隔;分化;生活风格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1)
第二节 文献述评	(4)
第三节 概念界定	(24)
第四节 研究设计	(28)
第二章 社会区隔理论资源与相对贫困的再生产分析框架	(32)
第一节 区分的符号系统与社会区隔的意识	(32)
第二节 相对贫困的再生产:社会区隔与自我区隔的分析框架	(37)
第三节 村庄背景与村庄分化素描	(44)
第三章 分化的图景:相对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风格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分析	(51)
第一节 居住模式及空间配置	(51)
第二节 饮食消费与身体(形象)管理	(62)
第三节 文化投入	(71)
第四章 区隔:相对贫困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及建构	(81)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交往区隔	(82)



第二节	人情仪式中的交往区隔	(91)
第三节	村庄政治参与区隔	(100)
第五章	相对贫困的再生产的逻辑与过程	(107)
第一节	共享价值缺失下退出村庄竞争,失去发展动力	(107)
第二节	被隔离与自我隔离的双重作用,发展机会减少	(116)
第三节	相对贫困者习性的延续与贫困的再生产	(126)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132)
第一节	研究基本结论:相对贫困再生产的机制何在	(132)
第二节	讨论	(133)
附录	(137)
附录 A	结构式访谈提纲	(137)
附录 B	无结构式访谈提纲	(138)
参考文献	(140)
后记	(151)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贫困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作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它是对人的尊严和体面生活权利的剥夺,对社会公正的亵渎;另一方面,贫困的外部性使之成为引发诸多社会、环境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根源。正因为如此,贫困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社会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实践成果举世瞩目。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试点推广到普遍推行,在农村市场化制度改革、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改变下,农民拥有了使用和管理土地的权利,多年蕴藏在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集中释放。据统计,1984年年底,我国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212亿元,与1978年相比提高了1.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97倍;^①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25亿左右,年均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4.8%。^②“吃得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在“吃得好”方面却没有足够选择的余地。1986年到1994年,在这一阶段,因城市改革的推进、国内工业企业承包制的实施,农民收入增长的势头受到了城市经济和工业企业快速增长的冲击,农村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带动效应减弱。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问题从此前的普遍性模式向分层、分块演化,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加重。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扶贫开发政策经历了大幅度调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扶贫对象和重点贫困县的确立及相关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总结经验 继往开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67页。

② 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页。



政策的出台,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1.25 亿人减少到 8000 万人。^① 1995 年至 2000 年,在国家一系列刺激和拉动社会投资的政策下,大规模连片区域的贫困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2000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指出,2000 年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这标志着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二元结构中,相对贫困人口已占据了我国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② 而由于区域间差距不断拉大,贫困由区域连片式分布向散点式分布转变。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建立了区域间的扶贫机制,即东部地区与西部贫困省份的东西协作帮扶扶贫模式,并将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纳入扶贫重点。从 2001 年到 2012 年,在我国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农民工群体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农村的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雇工群体等开始萎缩,农村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农业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地位上升。在此阶段,大面积的普遍性贫困问题已经解决,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程度不断加深,同时,贫困的特征也从收入性单维度贫困转向多维度贫困,贫困人口对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需求日益显现。从 2013 年始,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继续稳步提高,2015 年我国开启了脱贫攻坚的历史阶段,2016 年,中国农村综合发展指数达到了 0.677,与 2015 年相比提高了 0.028。生活水平维度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最大,达到 39.3%。^③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指出,我国农民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增收进入“多轮驱动”时期,^④ 在此阶段,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 2020 年,绝对贫困彻底消除,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也迎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刻。一方面是绝对贫困得以消除,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之间分化过大,产生了社会分层和农民相对贫困等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后脱贫时代”,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从摆脱以生存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的历程”。^⑤ 2020 年以后,我国

① 张琦,冯丹萌:《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 年》,《改革》2016 年第 4 期,第 29 页。

② 邢成举,赵晓峰:《论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及其对精准扶贫的挑战》,《学习与实践》2016 年第 7 期,第 117 页。

③ 光明网:《〈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http://difang.gmw.cn/bj/2018-07/25/content_30081600.htm,2018 年 7 月 25 日。

④ 光明网:《〈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http://difang.gmw.cn/bj/2018-07/25/content_30081600.htm,2018 年 7 月 25 日。

⑤ 罗必良:《相对贫困治理:性质、策略与长效机制》,《求索》2020 年第 6 期,第 19 页。



贫困治理的对象将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相对贫困治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的必然要求。尽管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永久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部分困难群众有返贫的可能,还存在着生计脆弱、内生动力匮乏等因素而带来的返贫、致贫的风险。对相对贫困的持续关注、找寻其发生根源并提出治理方案可预防贫困的再生产,巩固和扩大绝对贫困治理取得的阶段性脱贫成效。其二,相对贫困的治理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尽管绝对贫困治理有效改善了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但是离乡村振兴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就是减少贫困人口,使所有的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三,相对贫困的治理是化解农村主要矛盾,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农村困难群众而言,已由解决生存上的绝对贫困问题过渡到解决发展上的相对贫困问题的阶段。解决农民的相对贫困问题,一方面设计解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解决农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意见”^①。因此,认识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成为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紧迫工作。

既有的贫困/相对贫困研究主要聚焦三个主题:一是贫困元问题研究,也就是探索贫困是什么;二是贫困发生学研究,探讨贫困如何产生;三是贫困治理研究,也就是探索如何缓解或治理贫困。本研究聚焦贫困的发生学研究,探讨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

一部分经济学者对贫困的再生产机制的解释遵循“低均衡水平”的逻辑。低均衡水平最初由经济学者纳尔逊提出,用以解释低收入国家中人口增长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该逻辑被广泛运用于对贫困的再生产的推理中:最初匮乏资本或其他要素的贫困者由于缺乏改善自身困境的条件,因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如有学者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存在投资门槛,初始资本较低的贫困者无法对自身进行投资从而只能留在传统部门,其收入也停留在传统部门的较低水平,而这又再次限制了贫困者对自身进行投资。还有学者聚焦于信贷市场中的不同层次群体的行为,指出贫困者由于资本的匮乏而难以申请抵押担保资产

^①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农村工作通讯》2020年第4期,第6页。

贷款因而只能维持原本的投资少、收益少的生产，从而落入持续性贫困的境地。在低均衡水平的解释逻辑下，通过物质资源或资金的补助便能中断贫困者不能自由选择的循环链条。而现实是，简单直接的“缺啥给啥”的福利政策对于帮助贫困者脱贫并不总是有效，甚至会带来再次返贫的“意外后果”。也有学者从共同体内部文化切入对贫困的再生产机制进行阐释，如有学者提出“平层压力”，假定共同体内部享有同样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共同体会通过施加平层压力，使被压制的成员和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留在相同或相似的位置，从而直接抑制了或破坏个人流动及向上的努力。该观点适合用来解释传统或特殊的部落、族群以及其成员的持续性贫困，而对于现代社会中更为普遍的群体、个体的贫困的再生产则缺乏解释力。也有学者从社会排斥切入，认为来自外部社会世界的排斥构成了贫困者某些社会权利的丧失以及形塑了贫困者的负面心理，而负面心态又会指引贫困者的行动，由此陷入贫困的循环。低水平均衡论只注意到结构层面的因素，平层压力聚焦于文化层面的因素，社会排斥论的贡献在于同时考虑到了结构与文化的因素，它是从外部社会世界与贫困群体/者的互动的角度来考察贫困的再生产问题的。不过该观点的盲点在于简化了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即只注意到其他层次群体对贫困群体施加的作用，认为贫困者只能被动调试被排斥的状态。贫困者是否也会主动参与这种关系建构并影响自身的贫困状态？该观点尚未涉及，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探索贫困的再生产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笔者认为，相对贫困的再生产的机制应从贫困者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贫困者个体或群体间的具体互动来考察。具体而言，本研究尝试回答如下问题：首先，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塑造下的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群体，其生活风格的呈现及其分化图景；其次，不同生活风格主导下的群体及个人是如何进行关系建构并塑造出区隔的；最后，社会区隔如何作用于群体及个人的发展轨迹，进一步揭示相对贫困的再生产机制。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关于贫困发生学的理论梳理

从贫困的学术发展史来看，早期对贫困生成机制的解释主要为个人学派与家庭学派。如许多学者从个体主义范式出发，将贫困指向个人行为、人力资本等。这些理论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将贫困者视为社会中的弱者，其之所以弱，在于匮乏内生发展动力、能力、素质等。在对个人及家庭因素



解释局限的开辟中,自 20 世纪 60 年代始,更为系统的贫困解释取向应运而生,如一种类型的解释取向将贫困归因于既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认为贫困是“经济力”和“社会力”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另一类解释取向则将贫困归因于固有文化对结构变化的阻碍。

(一) 贫困成因研究的结构取向视角

社会因素衍生的贫困主要是指受相关制度、政策等影响,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阶层或群体、不同个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从而造成这些区域、阶层、人群和个人的贫困。

1. 社会制度贫困论

最早把穷人贫困的成因与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现象中,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贫困的成因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农民和雇佣劳动者被剥夺的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将现实世界的苦难根源归因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如果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财产,幸福是不能达到的。当每个人可以假借法律去拼命捞钱,而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财富,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为他们所瓜分,而其余的人只能变得贫困不堪”^①。现实世界的苦难根源为私有制与商品经济,与之相对应的,理想世界应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一旦金钱废除,也就渐渐没有了贫穷”^②。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最激进的批判者之一,指出私有制、宗教、婚姻制度是现存社会“三位一体的祸害”,罗伯特·欧文认为“目前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由于贫困而在全世界引起各种无法计算的罪行和灾难。它在原则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如同它在世界上不合乎理性一般”^③。无论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还是欧文试验并主张的公有制生产、消费合作社,都将废除私有制,建立没有贫困、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公有制社会作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部分,发展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剥削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阶级贫困以及国家贫困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

①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镗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页。

②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镗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5页。

③ [英]罗伯特·欧文:《欧文选集·第一卷》,柯象峰,何光来,秦果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页。



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从经济关系上确定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地位。私有财产制将从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财富向资本家流动的同时,工人愈趋贫困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选举制度从政治上确定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命运。资本主义的自由选举制度归根结底是一种“有钱人的游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参加竞选而需要支付的额外费用把贫困的工人阶级排除在外。

2. 社会政策贫困论

英国的“圈地运动”带来了百万无家可归的贫困者,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造成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剪刀差”下产生了农民的困窘,当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带来越来越多的贫困后果,学者们开始将矛盾聚焦于政策,认为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当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困。^① 持社会政策引发贫困问题的学者围绕着社会剥夺、社会排斥等解释路径对贫困问题进行归因。持社会剥夺理论的汤森(Townsend)在其《贫困国际分析》一书中对社会剥夺概念进行了以下阐释:“社会上一般认定,或在风俗习惯上认定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未能享受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他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丧失成为社会成员的身份。”^② 本文在此处讨论的社会剥夺主要在物质层面,文化层面的社会剥夺将在贫困的文化解释中提出讨论。社会排斥理论可以说是从社会剥夺概念中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如博查特(Burchardt)等学者指出:“个人生活、居住在一个社会当中却没有以这个社会的公民身份参与正常活动的状态,即为社会排斥;社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社会互动上的参与不足、不参与都可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③ 在贫困的结构解释的语境中,社会排斥通常被学者用来指某些社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等制度化原因而被推至社会结构的边缘地位的机制和过程。^④ 由社会政策导向的贫困可能存在两种理解方式,其一,制造或维系不平等来源于某种直接的政治意图;其二,政策失灵,即政策未能有效发挥或出现效果偏差。一方面,有

① 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50页。

② Townsend 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915.

③ Burchardt T., Le Grand J., Piachaud 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1991-1995*,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1999(33).

④ 周林刚:《论社会排斥》,《社会》2004年第3期,第60页。



学者指出由于福利政策的存在,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福利投机和依赖;而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在地方国家和经济干预加剧的情形下不但不能消除贫困,相反会加剧农村贫困现象。^①

以上非预期结果揭示了纯粹靠经济发展、援助下的扶贫济困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当结构解释所对应的反贫困政策开始出现效果偏差,政界和学者们进入了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现象的反思,正如威廉·奥格本(W. F. Ogburn)的“文化堕距”观提出的: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如此便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而一般说来,“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变迁,而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来看,它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往往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念。^② 存在这样的可能,文化堕距形成了一种阻力,阻碍着结构的变迁。而作为阻力的贫困问题很可能与固有的文化阻碍结构变化相关。这也成为贫困的文化取向解释的出发点。

(二) 贫困成因研究的文化取向视角

1. 贫困者自身形成的贫困文化

艾利森·戴维斯(Ellison Davis)于1946年提出贫困文化的观点,在其《社会下层工人动机之研究》中,他假定存在一种迥然不同的“贫民区文化”,按照其观点,“毫无生活目标”、“懈怠”、“得过且过”等是贫民生活中普遍客观的真实写照,“贫民区的每个人往往适应于一个不同于培养造就中产阶段的物质、经济与

^① 按照潘泽泉的观点,自从财政实行中央地方“分灶吃饭”之后,地方在完成上缴的财政指标之后,可以保留财政盈余。地方财政独立后,中央政府减少对地方财政的投入,地方政府也要负起地方的开支,对于那些缺乏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往往出现困难。贫困地区集体财政的拮据产生恶性循环,一方面意味着地方政府无法为村民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以及承担公益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健等),只能扮演收税/费、罚款的角色。另一方面,集体财政的困难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与村民的紧张关系,因为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收入,由于没有任何的途径,只好巧立税费名目,将之转嫁到农户身上,这使经济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参见:潘泽泉,许新:《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学术研究》2009年11期,第46页。

^② [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页。



文化的现实,贫民区的每个人的习惯和价值也必然与后者大相径庭。”^①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类美国》等学者通过收集不同的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聚焦于贫困者的主体性概念架构。奥斯卡·刘易斯用贫困文化诠释贫困者致贫的一套规范和价值观,他在对墨西哥的贫民窟居民进行一系列研究后发现,生活在底层的穷人之所以无法获得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套与贫困者社会地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贫困文化一旦产生,就有一种生生不息、难以消灭的态势。在贫民区当中,孩子们到了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的亚文化所濡染,并接受了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此后,即使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机会,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他们甚至终其一生都很难再利用新出现的条件和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境遇。”这里透露出奥斯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的宿命论色彩。

我国学者对贫困文化的研究最初基于经验层次上的探寻,意在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农耕文化等揭示贫困的自我复制性。如早期李强在《贫困文化之研究》中从贫困的知识和贫困的价值观两个方面探讨了贫困成因的文化因素。在本土语境中的贫困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守土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安贫守贱、安于现状的守常观;懒惰的人生态度与依赖观以及落后的消费观”^②。持价值观贫困的学者还有贾俊民,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他将贫困的价值观梳理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等六大特征”^③。学者赵秋成、倪虹、张国卿、苟建立、王培暄、王兆萍等也都探讨了植根于传统小农经济和封建色彩的心理机制和价值观念,认为贫困人口经历了从自卑到自贱再到自足的心理变动过程。

2. 文化排斥

在论及结构取向的贫困解释时,社会排斥概念已被提出探讨,而在此处,笔者将立足于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文化层面的社会排斥较鲜明地体现于种族中心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以自己或本民族的文化为标准或中心,来衡量其他人群或民族。同一民族中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也会排斥异于自己的群体。如美国自由派领袖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持的观点,

① [美]博希尔,宫琪,段丽萍:《贫穷的文化》,《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 年第 4 期,第 28 页。

② 李强:《贫困文化之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 期,第 74-75 页。

③ 贾俊民:《贫困文化:贫困的贫困》,《社会科学论坛》1999 年第 21 期,第 68-69 页。



“美国黑人遭遇的社会经济崩溃,是白人精心策划、种族歧视及其病态心理状态的结果”。排斥会以不同的形式对人群做出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类别区分,以造成富人、穷人,阶层、阶级之间的区别。文化排斥更多的偏向于一种认同排斥,即人们内在的、自我的选择,多受文化因素的支配,类似一种语境或支持背景,内在地支撑着那些属于外显的排斥。将“社会排斥”引入贫困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学界也非常流行,社会排斥研究通常注意到了贫困者的社会边缘地位,强调贫困者在社会交往、情感中不被认可、不受重视的状态。如曾群、魏雁滨指出,社会排斥对于贫困的研究意义在于注重考察多层次的不利条件如何使社会的边缘群体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从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文化排斥因“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以及价值观念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①。也有学者将排斥概念来指称普遍流行的文化和社会舆论所倡导、宣扬的价值观念与部分群体生活状态之间的差距由此带来的相对剥夺体验。^②

对于文化致贫的观点,我们可以做如下梳理:贫困者对贫困的生活适应方式可以诠释为一种贫困文化。大多数贫困文化论调都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贫困文化一旦存在便很难消除,且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一方面贫困者容易陷入更深层次的贫困,另一方面因代际传递长期存在——儿童吸收亚文化群中的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便成了他们个性和特征的永久组成部分,因而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关于贫困的再生产的研究梳理

(一)基于制度、市场因素的解释机制

盖勒(Galor)认为,制度失灵和市场失灵是构成持续性贫困以及贫困陷阱

① 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文化排斥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社会边缘群体中,如韩庆龄在“老实人”光棍群体形成分析机制中,将村庄舆论对该群体的观念重塑和负面评价视为一种笼罩性的弥散结构力量,使“老实人”群体难以克服自卑来实现超越,参见:韩庆龄,《结构边缘与文化排斥:农村“老实人”光棍的社会形成机制》,《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银平均则分析了“臭名”标签对农村人口的排斥,参见:银平均:《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文化排斥也应用于解释移民适应问题,如李煜通过对上海居民对移民的态度进行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土客文化认同和差异而导致的排斥稳定而强烈,从而导致部分移民产生“受挫怨恨”心理,参见:李煜:《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学海》2017年第2期。

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们将阻碍贫困者采纳利于其跳出陷阱的选择,贫困的自我强化机制就在这种持续性贫困中衍生。其中制度失灵表现在政治体制、社会规范以及群体习俗等方面,市场失灵表现在收入分配的缺陷、信息不完备以及欠佳的市场结构等方面。贫困的再生产可能直接来源于制度的失灵,亦可能来源于制度失灵与市场失灵的相互作用下的长久的无效率状态。^①

在体制、制度、政策作用的解释框架下,有学者提出政府资源配置会导致贫困的再生产,认为由于扶贫资源在分配中出现了偏向精英利益的趋势,因而拉开了贫困者与富裕者之间的差距,长此以往会使贫困者形成认输心理,间接地引发家庭及个体发展的挫败感,从而构成贫困文化,使得贫者更贫。^②也有学者指出政策调整的政治性建构会再生产贫困,如中国的土地制度,以及诸项农业政策的调整使得农民即使一时间摆脱贫困也可能再次陷入贫困。^③还有学者认为体制外贫困所带来的权利贫困作为一种典型的结构性的规定,很可能转化为内在的文化规定,从而生产出一种群体性的贫困亚文化,当贫困群体对自身底层社会角色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认同时,就将丧失改善自身社会位置的动力,外力介入的各种反贫困措施很可能将遭到贫困亚文化的解构。^④带有“社会排斥”性质的体制、制度和政策使得贫困再生产,而过度干预的政策同样会走向贫困再生产的结果。有学者就认为,贫困再生产是制度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效果”^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城市社会保障补差制和低保捆绑式救助会构成对贫困者的负向激励,由此陷入低水平生活的贫困循环陷阱。^⑥

在市场作用的框架下,有学者认为制约脱贫的因素呈现出刚性的特点,即在机会、资本、利润的场域中,一些群体由于占有资源、资本、技术、关系、信息和权力等优势而优先获益。当不同群体凭借其特有的资源在市场中相互

① Galor O,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60): 35-52.

② 邢成举:《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制度、权力与社会结构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③ 潘泽泉,许新:《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④ 徐琴:《城市体制外贫困社群的生产与再生产》,《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⑤ 热孜完·艾力:《贫困的再生产:城镇低保制度的救助效果研究——以上海市三林镇为例》,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⑥ 参见:郭跃:《试从公平与效率角度探讨“贫困陷阱”问题及其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1期;王喆:《城市低保中的贫困陷阱成因及解决》,《法治与社会》2011年第24期。



竞争时,在强弱的结构关系中,强者垄断了机会和利益。^① 由于市场信息不够完善,受教育或培训水平较低的、社会网络薄弱的贫困者难以获取完备的信息,因而提升了贫困者的求职、转型的策略成本;还有因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产权制度缺失,贫困个体实施高回报活动。戴维·S. 兰德斯(David S. Landes)提出要素短缺论,在资金要素短缺与土地要素短缺的情况下,贫困者所能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因而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投入来扩大或维持土地产出和物质生产,而贫困地区的贫困者通常只能以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人口的方式增加劳动投入,由此陷入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② 一些学者也从信贷约束与金融风险的视角论述了贫困的再生产机制,这种观点的出发点为低收入者常常缺乏抵押担保物,由于受信贷规则的约束,无法贷到足够的金额,因而致富也显得遥遥无期。对于低收入者而言,信贷限制了他们获得更高收入,这也就导致了经济学中的低均衡水平贫困陷阱:收入决定财富,低财富水平限制抵押担保程度,而低担保又使得其无法参与高收入活动。如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与纽曼(Newman)认为信贷市场的限制影响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具体演化逻辑为:社会中的个体会根据其最初的财富选择不同风险程度的工作;是投资无风险的资产,还是选择有风险的自雇经营抑或是企业。虽然拥有较少财富的个体可以通过借贷选择后两类事业,但是信贷市场的规定如担保抵押资产多的人可以以低成本贷到资金,而拥有抵押担保资产少的人想要贷到和前者同样的资金则需要更高的成本。在此现实下,最初的资产拥有量将决定其从事的类别与收入,由此最初拥有资产少的家庭将落入持续性贫困的境地。^③

(二)基于家族/家庭共同体的解释机制

该视野是从家族/家庭共同体出发,核心观点为:第一,在家族/家庭内部,由于贫困个体所处的家族/家庭共同体无法为其提供求学、求职、生产或生活等方面的帮助,或其家族/家庭的负面状态波及、传递给个体,因而致使贫困的家庭以及家庭成员持续陷入贫困当中,这一点在学界中得到广泛研究。第二,同

① 李小云:《贫困人口陷入“结构性贫困陷阱”了吗》,《农民日报》2015年5月27日,第3版。

② [美]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③ Banerjee A V,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2):274-298.